

胡小林 袁伯诚 主编



中国 学习 思想 通史

【下册】

人民出版社

中国学习思想史

【中国】

商务印书馆



胡小林 袁伯诚 主编

中国学习思想通史

【下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第六编

元、明时期的学习思想

这一时期包括元(公元 1271 年—1368 年)、明(公元 1368 年—1644 年)两个封建王朝。

甲 编

综 述

- * 元、明学习思想的社会背景概述
- * 晚明空疏学风与实学思潮
- * 元明教育与科举制度对学习思想的影响
- * 学习文本的整理与研究

第一章 元、明学习思想的社会背景概述

第一节 政治状况及其对学习思想的影响

元朝重新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南宋以来百年多的分裂局面。在元朝统治下,形成了一个以蒙古族为统治民族,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忽必烈提出“蒙汉一体”,不仅中原居民、北方居民得以进一步融合,而且西北、西南的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也比过去大大密切了。同时,在中国由于几次大规模的“西征”,带回了大批中亚、中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再以他们为主体,形成了中国的回族。元朝,中国境内多民族融合是主流,是历史发展之大势。元以后,“中国”一词已取代汉民族国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的称谓,开始出现于与西洋、东洋人的交往中。

元代,民族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特别是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由于统治地位的互易,矛盾斗争还相当激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中充满血与火的斗争。但是,蒙古统治者也不得不正视作为占国家总人口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这一事实。而且,汉族有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程度都比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高,不用汉族的语言和文字就无法实行统治,汉族的这种数千年形

成的经济根基和文化根基的深厚和不可征服的凝聚力以及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亲和力,是历经万劫千难而不散的。历史证明,“夷”可以治“夏”,而不能变“夏”。孟子说的“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幽谷者”^①是有道理的。文明程度低的向文明程度高的学习,所谓“向慕风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蒙古族入主中原,没有能脱离“为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②这个民族融合的历史法则。蒙古族在北漠崛起,南下中原,一方面固守着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方面受着西域文化尤其是畏兀儿文化的强烈影响,他们对于中原农业区的汉文化虽然比较难以适应和接受,但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诸帝大都表现出对汉文化的爱慕和维护。忽必烈是尊崇儒家典籍和重用汉族士人的,诸如杨惟中、姚枢、宋子贞、郝经、王文统、许衡、张文谦、刘秉忠、窦默等儒学渊深的名士硕儒,都聚集于忽必烈的帷幄之中。王恂、孟攀鳞等人都为忽必烈讲解过儒家经典。忽必烈对儒学教育也很重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式立国子监而定其制,四年后又下诏在全国诸路学及县学内设立小学,并注重培养与造就一代蒙古儒者。忽必烈之后,在接受汉族文化的皇帝中,可以仁宗、英宗、文宗为代表者。仁宗“大兴文治”,皇庆二年(1313年)“诏(许衡)暨宋九儒(周、二程、张、邵、冯、朱、张(栻)、吕)从祀宣圣庙庭”,“时方议行贡举”,设科取士。英宗“以儒道治天下”。文宗工诗、擅书、能画,重视文化事业,“文治灿然可观”,曾命虞集等儒臣编修《经世大典》,设文化机构奎章图。综上所述,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者在经济、文化上与汉人逐步接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祭孔崇儒,尊道亲释,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元朝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极深刻地影响着、规定着这一时期学习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

思想的发展。元朝确立程朱理学为官学,因此,程朱理学学习思想成为主流。

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没落阶段,汉唐恢弘气象一去不返。中叶以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如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增长,这是社会生产中的新因素。《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记载:在江南纺织业中已经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具有雇佣劳动性质的新型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促进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分离,推动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封建自然经济起到了分解的作用,也使人们的思想因之发生了某种新的变化,它唤起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它以批判脱离实际的理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为基本特征,在本质上是与理学相对立的。此外,明代的边患日趋严重,西北有蒙古族的鞑靼、瓦剌。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与瓦剌交战,失败,英宗被俘,发生“土木之变”。明世宗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有“倭寇”(日本的一部分武士、浪人、商人组成的海盗武装)侵夺骚扰,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侵占澳门。东北则被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征服建州各部,完成了女真族各部的大统一,具备了南进中原的条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民族矛盾激荡而处于劣势,都深刻地影响着文化思想的发展,当然,也制约着学习思想的变易。

第二节 元明学术流派概况

元、明两朝皆为理学所主宰,而具体情况又有所差异。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学是在元代。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下诏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熹从祀孔庙,标志着理学开始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元朝思想、学术承袭程朱,特别以朱熹为主;明朝除程朱的影响外,陆九渊的

影响也存在,明中叶以后成为主流。

宋明时期是理学的发旺期,也是由盛而衰的演变期。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和《宋元儒学案》的叙述,理学演变的过程大致为:

北宋初胡瑗、孙复、石开“三先生”开义理说经之风,倡“明体达用”之学于苏湖、齐鲁,是为宋明理学之开端。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二程阐发“性道微言”,弘扬孔孟正学,创立濂、洛、关学,奠定理学基础。及至南宋,朱熹集二程洛学之大成,陆九渊以“发明本心”为主旨,别立心学一派,理学从此分野,两宋时期理学的演变在上编已有叙述。入元以后,朱、陆合流,陆学逐渐沉寂,而朱学凸显。爰至明初,朱学仍居于统治地位,学人“非程、朱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在朱学极盛一时之机,而陈献章则承陆学之余绪,开启明代心学之先河。明代中期,王守仁继起,集陆九渊以来心学之大成,王学一时风靡天下,传人遍及大江南北,出现许多流派,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王学之分,而以江右王门得王学之正传。晚明,王学因其末流袭空蹈虚,清谈孔孟而溺于禅释。东林朱学奋起,尊朱黜王。刘宗周创立蕺山学派,力矫王学末流之弊,遂成为明代王学之殿军。以上是黄宗羲在两部《学案》提供的关于宋明理学发展全过程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研究宋明时期的学习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特征极为重要。宋明时期的学习思想离不开理学,离开理学就没有学习思想。

黄宗羲的两部《学案》还对明初朱学学统和明中王学学统的思想脉络进行清理和辨析,这对我们研究明代学习思想极为有用。黄氏认为,明初理学,同出朱学,分为两支:江西吴与弼的崇仁朱学和山西薛瑄的河东朱学。论学统,吴、薛二人均无直接师承,而“一禀宋成说”。^①“大抵恪守紫阳家法”,^②但学风异趣,吴与弼治学重“涵养”,门人陈献

① 《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14页。

② 同上卷首,莫晋《序》。

章发挥说师,远继陆学余绪,从而开启明代心学之先河;薛瑄治学重“践履”,“多兢兢检点言行间”,^①其传人恪守师说,理论上无大建树。对于王守仁,黄宗羲认为阳明“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始泛滥于辞章,继而膺服程朱理学,后又出入佛老,终于通过“龙场悟道”转向心学。^②故论王学学统,有由程朱而返陆学的转变过程。

元朝理学奉程朱为正宗,从元代官修《宋史》设传的倾向性也可以看出来,《宋史》首次将宋儒按“道学”和“儒林”分属,程朱入《道学传》,“三陆(南宋陆九韶(梭山)、陆九渊(象山)、陆九龄(复斋)三兄弟)之学”为南宋心学之重镇入《儒林传》,突出程朱在道学传承中的正宗地位,尊程朱而贬陆学,这种一反汉唐以来正史总“儒林”为一传的编纂传统,反映出当时程朱与陆学在意识形态中所占的地位的重与轻。

第三节 朱学之衰,王学之盛

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来,到南宋末年被官方认可,元代取得官学法定地位,历经宋、元、明三代长达六百年的发展演变,分化离合,形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自始至终受王官之学(官学)与民间之学(私学)对立、互动、转化、移位之规律的支配。一种学术当它起自民间则生机勃勃,当它进入庙堂成为官学便由极盛而开始走向衰微,理学由两宋书院(民间私学)起家,到元、明由学术变成为官方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道”与“势”合流。学问一旦变成权力运作的工具,也就丧失其思想自由和独立品格,其衰落而僵化而独断,必然失去生命力。

①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薛敬轩瑄》,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2页。

② 同上卷十,《姚江学案》,第180—182页。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元、明时期,虽然体认天理所“从入之途,各有所重”,前者主张“格物穷理”,后者主张“发明本心”,但他们“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黄宗羲语)却是一致的。由于明初,程朱是官学,这是其衰落的开端。

从南宋至元、明初占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经过近二百年的官学发展史,到明代中期其流弊已十分明显,烦琐支离、八股习气浓厚的朱学已经成为无用之学,朱学“存天理,灭人欲”被曲解成生理学、心理学层面上的“饮食男女之欲”的禁欲主义主张而失去其道德本体论哲学意蕴之后,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市民阶层兴起的社会发展相左,其遭到批判也是必然的。而明代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正统地位带有严重的垄断性而成为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从学术层面考察,它既扼杀了学术多元争鸣的生机,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没有对立面斗争、挑战的学术剩下的只有独尊的“虚荣”而无“道者反之动”之推动力。自元代开始,科举取士,非朱子之论不用,以朱注《四书》为科考法定文本为依据,明代更变本加厉,朱子学演变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牵制知识分子思想的教条,失去了作为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道德精神功能。

陆王心学之勃兴 明中叶出现的社会危机,迫使人们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朱熹理学进行反思,决心告别朱学,转向理学的另一分支——陆学。于是在明中叶出现了由朱熹理学向陆九渊心学转变的历史趋势,形成了崇尚心学的社会思潮。其代表人物为王守仁(阳明)。“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①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杂糅儒佛,形成了“心学”体系,以与程朱学派对抗,势力大增。如《明史·儒林·吕柟传》说:“时天下学者,不归王守仁,

^① 《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78页。

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吕)柟与罗钦顺云。”^①

早在南宋“鹅湖之会”上,陆氏兄弟已指出朱学烦琐支离之弊端。朱学的这种烦琐学风传至明代变本加厉,“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②特别是学人染上八股之恶习,使道学成为滥熟而无用的格套。而王学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重视思辨能力的发挥,在为学上补救了朱熹学派之失,改变了朱门后学支离烦琐、帖括拘泥的学风,活跃了学界的哲理思维,提高了学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平,在中国学习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朱学之弊在于桎梏于辞章训诂,轻视“自心自性”的发挥;王学则提出了一个“心”字作为“对病之药”,使学习在反求于自我,做到“精神不损”,这是改造朱门学人中“冬烘先生”的妙法,王学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惩“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③使士人“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④当然,在王守仁“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⑤的学术思想气氛中,朱门后学也随之失去明初理学家强调博学多闻、向外求索的特点,走向专主向内涵养、主敬复性的治学路向。

这说明王守仁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继朱熹之后最有创见的学习思想家。而心学风靡百年,表明它是一种社会思潮的形而上的概括,它的出现适应了明中叶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明清之际人在批判王学时,往往忽视其出现与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忽视王学在当时的积极面,就抓不住明代学习思想的主脉。

① 《明史·儒林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244页。

② 王守仁:《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明隆庆刊本,下同,简称《阳明全书》。

③ 《阳明全书》卷二《答聂文蔚》,《四部丛刊》本,第一册。

④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清光绪丁丑刊本。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黄汝成《集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第四节 王学分化及王学末流走向极端

王守仁死后,王学开始分化而成为七派,从学习层面看有人将其分为“尊德性”主“顿悟”的王学左派和“道学问”主“渐悟”的王学右派,以“左”、“右”标识未必恰当,但按其对王学知行观的理解不同而分为两大派大致不错。两派中以泰州龙溪学派占主流地位。“自东越(王守仁)之变为泰州(王艮)犹未至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颜山农“读书不能句读,亦不多识字,而好意见,穿凿文义,好奇邪之谈。”^①王艮之后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②与颜、何二人近似“狂禅”的还有李贽,既是阳明心学的继承者,又是它的反叛者。他们把王学的“圣人观”推向极端,鼓吹离经叛道和“率性而为”的非理性主义。本来王学中包含有追求思想解放的积极因素,而他们仅“求诸于心”而走上“反道乱德”而离开王学的根本性命题而改变面貌,走向心学的反面。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立场来看,他们有罪过。所以顾炎武斥之曰:“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③而现代学者从反封建的批判立场出发,又高度评价、肯定李贽,所谓“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这正是阳明心学进步历史作用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冲击封建礼教的进步意义”。

① 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五,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四库全书》本。

② 黄宗羲:《泰州学案》,《明儒学案》卷三二,同上,第703页。

③ 《日知录》卷一八《李贽》,清黄汝成《集释》本。

第五节 坚持考据学风,抵制王学空疏学风

朱熹的学风本来就是义理与考据并重的,其考据学的影响在明代仍然存在,而与空疏之学形成对立之势。明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做宰相,锐意改革,其在思想方面批判的主要靶子就是王学,他认为:“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救世者所深忧也。……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兔鱼未获,无舍筌蹄;家当未完,毋撤藩卫。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乃挠上之法。”^①张居正以宰相的地位批评王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明代万历以后,心学占主流,其弊端也日益明显,一些学者与心学空疏学风相对立,承袭前代考据学的传统,读书治学走出另一条路子。首开考据之风的应推明正德年间的杨慎。杨慎(1488年—1599年)号升庵。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因力谏激怒皇帝和权臣,谪戍云南永昌卫,一直到死。“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②杨氏极诋陆、王心学,推崇朱熹,继承其考据传统,广征博考,遍涉经史百家。他曾对别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尝奉使过镇江,谒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成诵。慎惊异,益肆古学。既投荒(谪戍)多暇,书无所不览。”^③其治学成果主要集中在《丹铅录》。陈第(1541年—1617年)号一斋,博极群书,著述甚富,无征不信,考据谨严。在明代考据家中,以专精著称,发展了考据古音的科学观点,彻底破叶音之说,在古音的考证方面前无古人。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

① 《答屠平石书》,《张太岳文集》卷二九,1935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本。

② 《明史·杨慎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083页。

③ 同上书,第5083页。

古音义》等。焦竑(1540年—1620年)号漪园、澹园。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明史·文苑传·焦竑传》称:“竑博极群书,自经史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①焦竑重视文字、音韵、训诂,长于订误和校勘,注重古文献的考证。胡应麟(1551年—1602年)号少室山人,万历四年(1576年)举人,久不第,筑室山中,藏书四万余卷,手自编次,多有撰著。胡氏擅长考据,尤精辨伪,成果集中于《少室山房笔丛》。胡氏对心学为代表的空疏学风作了有力的批判,他说:“古之世之称材者词章问学出于一,而今世之称材者词章问学出于二。”^②又说:“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鹵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③他主张辞章问学统一,博与精统一,反对束书不观,师心自用。他说自己“不敢以鸿儒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④晚明的考据对明清之际的实学学风和清代考据都产生深刻的影响,考据学风正是明代学习思想的一个主要的流派,虽然在整个明代不占主流地位,但它在与心学空疏学风的对立中也在发展,在学术上也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第六节 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

考据学与实学有同有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在典籍书本下功夫二者有共同点,就经世致用来看,考据与现实社会政治有疏离,而实学却紧紧追随时代的脚步,以改造现实为其旨趣。明中叶以后,吏治腐

① 《明史·文苑传·焦竑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393页。

② 《少室山房类稿》卷八十六《黄尧衢诗文序》,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江湛然合编刊本,《四库全书》著录。

③ 《诗薮》外编《三唐上》。

④ 《少室山房类稿》卷一〇一《与王长公第二书》。

败,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化,朝野上下有识之士都看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他们反思各种社会问题,归结到空谈心性的学风上,如罗钦顺、王廷相、高拱、吕坤等,倡导“黜虚求实”,为学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宗旨。前文提到的宰辅张居正在田制、赋税、水利、兵制、漕运诸方面进行改革,要求学人“尚本业”,做学问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谈玄弄虚,主张将政治上的变革和学术上的求实结合起来。在晚明经世思潮中,以东林学派影响最大,其代表人物为顾宪成、高攀龙。下面将以专节对其进行叙述评价。

明末实学思潮大体上是由王学返回朱学。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和总结,尊朱黜王,仍然属于南宋以来朱、陆之争的延续,属于理学内部“道学问”与“尊德性”分野深化的思想进路,属于理学内部不同学术方向的自我调整。从这方面看,明末实学思想与清初实学那种批判、总结整个理学发展史中利与弊,从弘扬经史入手,反思明末清初的历史教训不尽相同,当然二者有一定联系,只是前者的实学意识模糊,后者的实学意识清醒,由前者到后者是一个由理学走向实学的深化过程。

第七节 西方文化、科技的影响

明万历以后,中西文化开始交流,这是研究中国学习思想绝对不能忽视、轻视的现象。当时,西方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到澳门传教,以后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二月,在北京建教堂传教。传教士带来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如历算、测量、水利等方面的科技书,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关注,如徐光启(1562年—1633年)与传教士交往,与“洋人”一道研究科学技术,在当时徐氏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极为广博者,天文、历法、算术、水利、测量、农桑、物理均通习,编著《农政全书》六十卷,保存了历代的农业科学资料。徐氏精通西方

语言文字,翻译了许多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如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等。受西学启示宋应星(1587年—?)于崇祯八年(1635年)写成《天工开物》十八卷,介绍了农业、纺织、染色、制盐、造纸、烧瓷、冶铜、炼铁、采煤、榨油、军火制造等工、农业技术,系统整理了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取得的科技成果。此外,科技领域还有徐宏祖(1586年—1641年)的《徐霞客游记》这样的地理、文学上的巨著,李时珍(1518年—1593年)的《本草纲目》这样的药物学、植物学的名著。晚明接受西学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人还有李之藻(1565年—1630年)、朱载堉(1536年—1611年)、方以智(1611年—1671年)等,有人把以上学者称为“西学派”,他们是否可以称“派”另当别论,但他们确实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历算、机械、地理、农学等,翻译并出版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西方科技著作。他们在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时,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讲“会通”中西,这是传统学习思想中所没有的,是新鲜事物,新生力量,不仅对明清之际诸儒实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传统学习思想都是一种冲击与挑战。当然,明代学习思想中的自然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利,限制与阻力还相当大。中国在元明前本来就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创造发明的良好传统,有些科学门类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明代以后,受心学的干扰、冲击,传统中的自然科学没有获得顺畅的大发展,从而落后于西方。徐光启在分析心学给自然科学带来的危害时说:“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士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往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①

^① 《徐光启集》卷二《刻同文算指序》,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石声汉校注本。